

汤一介集

和记者谈心

记者的访问记

◎ 汤一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汤一介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1

(汤一介集)

ISBN 978-7-300-21917-2

I. ①和… II. ①汤…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530 号

汤一介集

和记者谈心

——记者的访问记

汤一介 著

He Jizhe Tanxi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36 插页 2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3 000

定 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由于读了一些名著，我对人生、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于是，我选择哲学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我购买了不少书，有五万余册。当然，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其他翻翻而已。在开始写作时，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 50 年代后则失去了“自我”，只是到 80 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严格地说，我是 80 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

在 80 年代后，我头脑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作为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两个虽有联系但却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个方向发展呢？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在七十五岁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编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学问题。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创构一有重大意义的哲学体系。但思考哲学问题的习惯，使我还是在关注某些哲学问题，只要有时间我就把这些问题写作成文，作为我思想的记录，也希望得到同行的响应和批评指正。

本想为此文集写一“总序”，但我近日有病在身，就写这一短短的“前言”吧！好在本文集每卷的卷首，我都写有“自序”，读者或可对我写作的意图有所了解。

汤一介

2013年11月24日

自序

本卷虽以《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为书名，但实际上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记者对我的单独访问，这种访问大约有上百次，我只选了几十次，为的是避免重复。第二部分是对我和乐黛云共同的访问，但实际上也是我们各人谈各人的，并没有在思想上进行交锋。第三部分是我的一些同行、学生或者记者写对我的认识和我的思想的了解。我想也许可以帮助读者从多方面对我的为学为人有所了解。

人无完人，学者的学术思想也没有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在学术思想上、在理论的论述上（特别是哲学学科），哲人应该谦虚，应该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我常常喜欢引用两段颇有启发性的名言警告自己，也介绍给我的同行和学生。一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草稿片段中说的：“在黑格尔以后，体系说不可能再有了。十分明显，世界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即有联系的整体。但是对这个系统的认识是以对整个自然界和历史的认识为前提的，而这一点是人们永远达不到的。因而，谁要想建立体系，谁就得用自己的虚构来填补无数空白，即是说，进行不合理的幻想，而成为观念论者。”^① 另一段是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哲学决不会完全正确，但是自圆其说的哲学满可以全盘错误。最富有效果的各派哲学向来包含着显眼的自相矛盾，但是正为了这个缘故

^① 恩格斯：《世界是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恩格斯〈反杜林论〉参考资料》附录，137页，1962。

才部分正确。”^① 这两段话对我们研究哲学或其他文化学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我写的论文，或我与记者的谈话，我从不认为它们都正确，但我努力做到说我想说的，我愿意说真话，特别是对年轻人，我不能说假话。因此，在和记者谈话中我往往是说得比较多而且坦诚，但我要求他们在发表时，先让我看看样稿，并往往会删去一些不宜见报的话。这样免得给我和记者（甚至该报刊）带来什么麻烦，但发表出来的可以说都是我想说的。我有自知之明，由于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甚开阔的眼界，我讲的话定会有错，但只要我认识到，我是愿意纠正的。

汤一介

2012年11月26日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马元德译，1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目 录

清醒远见的中国哲人	1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	4
中国文化，可作为两岸对话基础	8
走向世界 走向现代	
——汤一介先生访谈录	10
哲学：走向实践	
——访著名哲学家汤一介	19
文化历程的反思与展望	25
汤一介：给百年思想方程一个新解	40
复兴文化书院 独缺大师之魂	46
汤一介：谈中国文化书院	50
汤一介：传统是根	53
当年常陪冯友兰先生挨斗	58
汤一介：在“传统”与“现代化”间踏出哲学道路	64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访著名学者、《儒藏》编纂与研究首席专家汤一介	69
汤一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73
正处于伟大复兴前夜的中华民族需要“反本开新”	
——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访谈录	80
哲学家汤一介（一）	105
用宽容、明智、理性的学术视角研究宗教	
——访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汤一介先生	123
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130

汤一介：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139
汤一介的哲学之路	147
汤一介：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155
汤一介：师者谆谆 儒骨仁心	162
汤一介先生谈治学门径	168
汤一介：正道沧桑	187
汤一介：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	202
汤一介：世事苍茫成云烟 六经责我开生面	216
“和而不同”，中国和平崛起拥抱世界	
——专访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文化艺术顾问汤一介教授	229
汤一介：自由是一种创造力	233
汤一介：未名湖畔的哲学名宿	245
不断提出问题 推动思想进步	
——访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	253
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访谈录	264
汤一介：否定普世价值无法建设现代社会	287
不要把儒家“意识形态化”	
——专访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 会长汤一介	295
汤一介专访：思骋寰宇界 岁砺金玉心	304
※ ※ ※	
文化多元化趋势	
——访汤一介、乐黛云教授	315
汤一介、乐黛云获加荣誉博士学位	318
闲情寄趣	
——记汤一介、乐黛云夫妇	319

汤一介、乐黛云：爱情之树常青	321
著名学者汤一介、乐黛云	324
汤一介、乐黛云：“学术上不能有指导思想”	326
汤一介、乐黛云：同行在未名湖畔	347
汤一介、乐黛云：未名湖畔学界双璧	35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	
——汤一介、乐黛云讲演及访问	371
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	
——汤一介、乐黛云教授访谈录	384

※ ※ ※

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

——读《郭象与魏晋玄学》	399
傅伟勋教授对《郭象与魏晋玄学》的评论	411
蒙特利尔世界哲学会纪行（节录）	413
迎汤一介教授来新亚书院讲学	416
汤一介先生与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423
《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哲学卷·汤一介条》	439
如切如磋，砥砺前行	
——编者前言	441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对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贡献	452
既开风气也为师	
——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启示录	485
以“内在超越”为中心的思考	498
汤一介先生与“普遍和谐观念”的重构	513
和亲、和谐及其他	
——贺汤一介先生八十华诞	538

4 | 和记者谈心——记者的访问记

哲学家汤一介（二） 547

大音希声

——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557

清醒远见的中国哲人

Terry Cheng

汤教授：“妥协与认同存在于任何事物。”

数世纪以来，一个关于外来文化是否应当影响中国的棘手问题一直受到争论。当代中国的一位主要哲学家——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认为，问题的答案是：是。

长久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思想被认为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现实当中的成功运用。今天，中国强人邓小平提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两位领导人不仅强调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化，同时也特别坚持将马列主义作为他们的指导思想。这蕴藏着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政治家的殷切期望。

在一位著名中国哲人的眼中，理想的中国文化则应当能够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他就是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对外来文化吸收的权威。汤教授指出，鉴古知今，与历史上进入中国的其他外来文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必须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然而，他还清醒地认识到，在此种结合形成之前，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出一种适应现代化需求并符合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正说明人们期望从其自身文化中寻求某种能够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东西。

汤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对于中国现代化应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远见卓识是他最近在香港接受《南

华早报》的采访时提出的。上个月末，他在香港出席了商务印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的庆典。在中国，商务印书馆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出版机构。

汤教授清醒地看到，许多来自西方的思想与理念能够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求。这些思想与理念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先进的机械与经济管理的范围之内，中国的思想与理念同样应该被现代化。在学术研究领域，其他西方思想和马列主义应当同等对待，即便事实上后者被看作是指导思想。

汤教授分析说，在历史上，中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1世纪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17世纪后主要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传入的西方文明，以及最近1919年五四运动后传入的马列主义。以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为例来说，佛教由于受到了帝王的尊信，在一定时期甚至取代了传统中国文化。然而，并不是中国社会去适应印度文化。恰恰相反，佛教主动适应了中国社会。汤教授认为，这种情形同样也会发生在马列主义上面。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运用也不应当仅限于政治与经济方面，而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汤教授说，1949年后，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中国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苏联实践的盲目接受，二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对此错误，中国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邓小平在处理当前问题方面比毛泽东好很多。以农业为例，在50年代，毛泽东在数年内将农业合作化迅速引入人民公社。毛泽东的激进计划失败了，原因是中国并没有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而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才是集体化的基础。相比之下，邓小平则很实际，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制度要求农民对其生产力负责。这种做法等于是对传统小农经济的一种认可，而商品经济也只有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

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然而将之绝对化了。实际上，“妥协与认同存在于任何事物”，汤教授强调，“中国走一条中和的道路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想要为国家与社会做贡献”。然而，他们的软弱性则必须受到谴责，“在困难面前，他们倾向于从社会中隐退”。

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入现实，不擅长以抽象方式进行思考，至今也没有建构出宏伟的成熟哲学。汤教授建议，一些知识分子应该被允许从每天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思考一些不是特别紧迫的问题。“他们应当被允许思考一些宇宙与生命的根本问题”。

在毛泽东思想的长期统治下，知识分子与学者被督促与社会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抽象概念与理论的研究被指控为资产阶级实践。然而，如果中国哲学要在国际上胜过他人，哲学家们就不应该满足于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汤教授宣称，他本人赞成多元论，反对一元论。“权威们希望一元论可以实现，然而在现实中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正如中国是多个民族的共同体一样，中国文化并不是一元的，只可能是多元的。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政治层面则不可能多元。如果多元未成熟而早产，结果必定适得其反。

原文为英文，题为 *Chinese Philosopher Keeps an Open Mind*，刊于香港《南华早报》，1987-09-03。由杨浩译为中文

全球意识观照下的中国文化

访问：高永强、杨再立

11月4日晚，记者前往北京大学中关村拜访汤一介、乐黛云教授夫妇。他们夫妇合用的书房里，线装的中文书、精装的西文书不大齐整却很和谐地共处一室，你会觉着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会通、融合。在这里，汤一介教授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听说目前燕园又兴“国学”热。您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能否谈谈现阶段提倡“国学”的意义？

汤一介：1949年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态度，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对传统文化破坏得更厉害、更彻底。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基本也是反传统的趋向。到了90年代，人们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只是一味地反传统是不是有问题？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都被反掉了，而有些糟粕的东西却遗留了下来。“文化大革命”时这种表现最为突出，一方面反封建，一方面又众口一声地喊“万寿无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道德断层。在这个时候提倡国学，是对“全盘否定传统”思潮的一个冲击。

问：20世纪初的时候，一些人曾倡导国学。在20世纪临近尾声的今天，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汤一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国学研究将背离我们的初衷。我是比较早提倡国学的，但我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倡国学，即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提倡国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中心论”的消退，整个世界文化呈多

元化趋势。如果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国学，很可能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发展之外。当然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文化特点，因为我们是多元中的一元，这是没问题的。可这种考虑必须在全球文化思潮背景下来考虑，否则就会游离于世界文化思潮之外，如果这样，我们就自己封闭了自己，重新滑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陷阱，拒绝一切，排斥一切，又一次错过进入现代的机会。这是很危险的。

一种文化，既是纵向的、民族的，又是横向的、时代的。中国文化的方位应设定在民族与时代的交汇点上。过分强调纵向，就容易忽略时代性，我认为目前强调文化的时代性更重要。

问：文化观念本身是多面的、复杂的，如果不站在全球的、时代的高度去观察它，有些概念很难说清楚，有时还会把糟粕的东西当成优秀的东西去弘扬。国学研究是一项艰巨繁重的工作。

汤一介：是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观念都是非常笼统的，是直观的、未经分析而得出的观念。由于未经分析，也就形不成理论体系，不成体系就不易被接受，更谈不上“操作”。再好的观念，如果只是观念，不能被接受和操作，意义也不大。因此，我们要对这些观念进行现代诠释。一个观念你要证明它，像笛卡尔用几何学方法证明“我思故我在”一样去证明它。经过现代诠释的观念才有意义。未经现代诠释的观念甚至良莠不分。如“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是未经分疏、没有界限的。而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必须在“二分”的基础上，讲主体性必须在有客体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再如“忠”、“孝”等观念，如不进行现代诠释，盲目地去“弘扬”，就会出问题。

问：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观念值得弘扬，可以为我们的现代文化建设及人类发展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源？

汤一介：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

这种和谐可以分四个层面：自然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身心内外都是和谐的。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念，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西方文化是讲“心物二分”，强调征服自然。当然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受益匪浅，但随着对自然的不断征服，许多问题就出来了：温室效应、臭氧层、核武器……这些东西威胁着自然的安全，也威胁着人类自身的安全，如果有一种“普遍和谐”的观念，就有可能避免这些问题。西方现代社会（又称后现代社会）是一个非常个体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是阻隔的，就出了许多社会问题，人的心理也不正常了，需要心理医生了……四个层面都不和谐了。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东方，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问：谈起我国目前的社会，有些学者常用一个词：“文化转型期。”那么，“转型期”有哪些特征？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应是什么模式？

汤一介：“转型”，我认为是指古代、近古往现代转。其实“转型期”从五四运动就开始了。那时大致可分为三大派别：激进主义，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保守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社会前进，不是一种力量推动的结果，而是多种力量组成合力推动的结果。所以，“转型期”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当定型后，向纵深发展了，才有一定方向。如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到汉朝定于一尊，儒家成为正统，才有了主导方向；宋明之际，儒释道三教合流，理学成为正统。其实，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也是由三种力量（西化派、西方人文主义派、保守派）共同推动的结果。“转型期”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

问：现阶段社会中，过去的价值系统动摇了，一些人失去了人生目标和行为规范，有人称之为“道德真空”状态。我们能否